

# 古苑文心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审美

张业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古苑文心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审美

彭敏 著

(桂)新登字04号

古苑文心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审美

张业敏 著

责任编辑：肖启明

封面设计：秦一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插页：1 字数：229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633—1929—8/I·098

定价：8.00元

# 目 录

<b>第一章 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b> .....	( 1 )
1.萌芽时期——先秦文论.....	( 1 )
2.演进时期——两汉文论.....	( 3 )
3.自觉时期——魏晋南北朝文论.....	( 6 )
4.发展时期——唐宋文论.....	( 11 )
5.成熟时期——明清文论.....	( 15 )
6.革新时期——近代文论.....	( 20 )
<b>第二章 古代文学审美的理论基础</b> .....	( 23 )
1.儒家思想对文学审美理论的奠基.....	( 24 )
2.道家思想对文学审美理论的奠基.....	( 31 )
3.佛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审美中的作用.....	( 38 )
4.“三教合一”基础上的文学审美原则.....	( 41 )
<b>第三章 古代文学审美方法论</b> .....	( 47 )
1.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	( 48 )
2.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	( 56 )
3.“知音”鉴赏方法论.....	( 63 )
<b>第四章 古代文学风格论及风格审美</b> .....	( 70 )
1.风格论源流.....	( 70 )
2.风格的产生.....	( 72 )
3.风格的美学形态.....	( 80 )
4.风格审美多样化与审美鉴别方法.....	( 87 )

<b>第五章 古代文学传统的审美趣味</b>	( 92 )
1.含蓄美	( 92 )
2.自然美	( 102 )
3.新奇美	( 108 )
4.音韵美	( 112 )
<b>第六章 古代文学审美范畴核心——意境</b>	( 117 )
1.意境和历史上对它的研究	( 118 )
2.意境的构成基础——意象	( 119 )
3.意境的审美要求	( 126 )
4.意境的审美特征	( 136 )
5.意境的铸造与熔炼	( 142 )
<b>第七章 古代诗歌及其审美特征</b>	( 146 )
古代诗歌概说	( 146 )
古代诗歌的审美特征	( 152 )
1.丰富的内蕴力	( 152 )
2.强烈的感染力	( 157 )
3.杰出的表现力	( 163 )
<b>第八章 古代散文及其审美特征</b>	( 172 )
古代散文概说	( 172 )
古代散文的审美特征	( 181 )
1.情意俱佳的文旨	( 181 )
2.布局精巧的结构	( 185 )
3.生动精确的语言	( 190 )
4.波澜起伏的表达	( 196 )
<b>第九章 古代戏曲及其审美特征</b>	( 201 )
古代戏曲概说	( 201 )
古代戏曲的审美特征	( 205 )

1.“主脑”一线贯珠的戏曲结构.....	( 205 )
2.虚实结合的戏曲人物.....	( 211 )
3.富于舞台表现力的戏曲语言.....	( 216 )
<b>第十章 古代小说及其审美特征.....</b>	( 223 )
古代小说概说.....	( 223 )
古代小说的审美特征.....	( 228 )
1.人物性格的典型价值.....	( 228 )
2.叙述的文学魅力.....	( 237 )
3.情节中的辩证法.....	( 246 )
<b>〔附〕中学语文古代文学课文的审美教学.....</b>	( 255 )
1.古代文学课文在美育中的功能及审美内容.....	( 256 )
2.古代文学课文的分体审美教学.....	( 261 )
3.古代文学课文审美教学的实施途径.....	( 269 )
4.语文审美教学与教师修养.....	( 276 )
<b>后记.....</b>	( 282 )

# 第一章 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

中华民族存在于地球上已有五千年历史。她不仅创造了人类先进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就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论体系之一。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思想资料，最早的是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当然文艺思想的萌芽还可以上溯到上古更为遥远的时期。即使从春秋算起，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著家蜂起，典籍浩繁，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充实、丰富、成熟的漫长过程。古代文学审美理论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只要了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能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脉络。

## 一、萌芽时期——先秦文论

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论述文学的著作和篇章，因为那时所谓“文”或“文学”，是文化学术的总称；只有一些关于诗歌的意见，是比较纯粹的文学见解。但由于古时诗、舞、乐三位一体而密不可分，人们对三者的见解亦互相联系，很难分开。因此这段时期的文论内容，便很难从当时的学术思想中划分出来。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变革时代。这期间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学术上出现了诸子蠭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

百家的哲学、伦理和政治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和美学思想。虽然还没有完整论述文学的理论专著和文章，但诸子学术著作中有关文学与审美的片断资料，已有不少不乏深刻的原则性的论断，对后世的文学与审美理论，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滥觞。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文学思想最有代表性，也影响最大。他们共同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础。

先秦时期，诗歌创作十分繁荣，产生了光照千古的《诗经》和《楚辞》。《诗经》中的诗多为周诗，时代更久远。由于诗歌繁荣，所以先秦文论主要是围绕着有关诗歌理论而发。如《尚书·尧典》所记“诗言志”的诗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季札对风、雅、颂的评论，《论语》所记孔子的“诗无邪”、“兴、观、群、怨”说，等等。有些论说已涉及到文学领域多方面的问题。如《尚书·尧典》记舜与夔的谈话即已涉及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及其特殊规律的问题；《周易》经传关于“象”的见解、对卦爻辞特点的概括、以及关于言、意、象的关系的理论，则已涉及到艺术形象及文学创作规律等问题；《老子》中关于“大音希声”的命题，更是涉及到文学审美特征的基本理论；《诗经》中关于“刺”的观念（如“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及孔子关于诗可以“观”“怨”的观点，实已包含着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因素；而《庄子》中作者对自己文学特色的概括（“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纵而不傥”）则可以视为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萌芽；季札和孔子评论诗乐时还提出了德、信、善、美等文艺审美标准和作家修养问题；孟轲亦提出了作家修养和一系列文学批评的原则；荀子则为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大都源于先秦，特别是儒道两家对后世的文论影响最大。儒道两家的文艺观点形成了双峰对峙，相反相成。儒家注重的是言志、明道、情感的正常抒发，注重文艺的

功利目的，为现实政治服务，倾向于现实主义；而道家倡导的却是超功利的自然无为的艺术观，反对为现实社会服务，认为艺术的本性是审美的而非认识的，强调传神的表现，具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当然，这只是我们今人的总结。

但正如前述，由于我国早期的文艺活动主要是诗、舞、乐三位一体并以音乐为中心，所谓文论实际上是诗、声、容三方面的综合批评。同时，整个先秦时期只有诗、书之分，而无文学与学术之分，文学观念还相当模糊，当时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文字著述一般都统称之为“言”或“言辞”（表现在口头上，是指人们的日常谈话和政治外交辞令），以致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除诗论之外，一般也都还没有从关于“言”、“言辞”的理论中独立出来。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

## 二、演进时期——两汉文论

汉代文论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学术思想密切相关。

汉王朝是在秦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初政治较为清明，使经济得到恢复；在文化思想上杂用王霸之术而又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思想领域相对较为宽松。但从武帝到宣帝七八十年间，是西汉政权最巩固、国势最强大、思想限制也最严格的阶段。特别是武帝刘彻为加强思想统治而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束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流风余韵，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而随着谶纬术的兴起，儒家经学便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迷信色彩而受人崇拜。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歌颂文治武功，追求“铺采摛文”、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辞赋日趋繁荣；而总结历史经验并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解释的需要，

又促进了政论与历史散文的发达。汉代的文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影响和学术思想斗争中，在辞赋、散文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汉代文论思想已将诗与乐分离开来，也开始把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以“文学”一词指学术（即“博学”），而以“文章”或“文辞”指文学和带有文学性的作品。虽然大部分文论思想仍是片断的，散见于哲学、历史等学术著作中，但已出现了一些专篇的文学论文，如《毛诗序》（即《诗大序》）、班固的《离骚序》和《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

因为儒家经学居正统地位而被“独尊”，所以汉代文论多有依经立论的特点，即以儒家经典作为立论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诗经》是儒经中文学性最强的，因此汉代的文论思想大多体现于对《诗经》的研究。《毛诗序》和郑玄的经书注释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汉人关于诗歌的理论专著。特别是《毛诗序》通过对《诗经》一些重要问题的阐释，全面地阐述了有关诗歌的性质、内容和体裁，强调了诗的培养道德、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以及诗的“美刺比兴”、“主文谲谏”等思维与表现特征。同时还要求诗的内容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规范；语言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等等。《毛诗序》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亦是汉儒诗论的总汇。这些正统的文学观点，对后代文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亦是汉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汉初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大都是肯定的。但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后，一些正统文人（如扬雄、班固等）便以儒家道德标准非议屈原及其作品，从而在我国文论史上挑起了一场大的论争。如西汉刘安高度地评价了屈原及其作品，认为“可与日月争光”，而扬雄在推崇屈原作品“宏博丽雅”的同时，却对屈原以死殉国的行为表

示不满，认为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东汉班固进而认为屈原作品中的忿恨和悲怨是“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大量神话题材更是“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但王逸却批驳了班固的指责，充分肯定了屈原的高尚品德和其作品的崇高价值。不过他的肯定还是从认定屈原作品为儒家经典承袭的角度出发（这实际是对屈原作品独创性的贬低）。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只有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的观点最为可取。他接受了刘安的见解，高度赞美屈原的高洁品德和爱国精神，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怨恻”特色。他认为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这一观点说明他已认识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他还认为屈原作品“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他在那里对屈原作品中提出的以小见大、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此外，他还从对屈原作品“怨恻”特色的评论中引出“发愤著书”的著名结论来，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的一次大胆的挑战和有力的抨击，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依经立论的前提下，以《诗经》为准绳来评价辞赋和史书，是汉代文论的一大特色。例如大辞赋家扬雄前期积极作赋，后期转而批评辞赋，认为赋的描写是“雕虫篆刻”，讽谏作用只是“劝百讽一”，不足为训，因而他提出“壮夫不为”的观点。他从“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立论出发，批评了辞赋过度夸张、堆砌辞藻的弊端。但班固却不赞同扬雄的观点。他认为赋是“古诗之流”、“雅颂之亚”，所以应该大力肯定。显然他两人都是站在“诗教”的立场上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论争，这些恰好表现出他们依经立论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他们在对司马迁《史记》的评论上。刘向、扬雄、班固等一方面赞美《史记》能“不虚美、不隐恶”，即继承了古代史书

和孔子著《春秋》秉笔直书的精神，因此把它誉之为“实录”。但司马迁的思想并不纯属儒家的思想范畴，在《史记》中也包含了不少“异端”思想。因此正统观念极强的扬雄和班固父子另一方面又对司马迁的异端说进行了贬斥，说他“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等等。

东汉后期的王充是继西汉司马迁之后又一次对儒家正统思想发起抨击的思想家。他著《论衡》的宗旨是“疾虚妄”而崇尚“实诚”。这也是他审美原则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为文须重内容、有独创，而反对因袭摹拟古人。同时，他又主张语言要明白易晓，而反对拟古故作艰深。这对正统的宗经、征圣思想无疑是一种逆反和挑战。这些理论原则虽是在讨论学术时提出的，但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两汉时期的文论主要还是从具体作家作品或某种体制的文学着眼所作的评述与概括，并不是从全部文学现象着眼和从整体上把握文学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文学观念也还不够明确，这正是我国古代文论演进期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 三、自觉时期——魏晋南北朝文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文论独立成长，并开始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魏晋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地主庄园经济逐渐巩固，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确立。曹魏统治者倡通脱，在学术思想上兼采法家、黄老之学。以后自魏晋迄南朝，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并糅合儒家经义的玄学盛行，与外来的佛教哲学一起，逐渐占据了统治思想地位，从而打破了儒术独尊的僵化局面，带来了哲学的解放和思辨的活跃，并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这种“自觉”就表现在文学终于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人们不再重文学的道德事功，而重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内容倾向抒写个人情怀，体裁更丰富，语言技巧更讲究，以致发展到后来片面追求形式华美。文风的这种重大转变，始于汉末魏初。先是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开始重抒情、重文采；发展到西晋，文风趋于绮丽；刘宋时，文学变成主要供士人审美欣赏的消闲品；至齐梁声律说兴起后，便更加以追求轻艳华靡为时尚。在这一时期中，骈文在散文辞赋化的基础上兴盛，山水诗在观赏自然和庄园风光的情趣中崛起，玄言诗和宫体诗亦先后风靡一时。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标志着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观念的质变，表现为一方面提高了艺术表现水平，同时也造成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泛滥。

这种“文学的自觉”倾向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尤其得到鲜明的反映。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考量：

### （一）文论家众多和文论著作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的文论研究是在前人理论和当时文学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展的。论述已不再限于一种文体和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广泛涉及多种文体和文学整体多方面的问题，并完全从其他学术著作中独立出来。文论家灿若繁星。他们除写出单篇文学论文外，还撰写出规模宏大的专门性文学论著。举其影响最大者，即有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曹丕《典论·论文》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陆机《文赋》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而完整的文学创作论；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两部文论巨著：前者全面研讨了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批评论、作家论等各方面的理论问

题（六朝之后的古代文论基本上都是在它的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与深化，刘勰堪称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后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诗论专著，理论上亦有其独特的建树。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这两部文论专著说：“皆专门名家，勒成为书之祖也。《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潮流别也。”（《文史通义》）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论家及论著还有葛洪《抱朴子》中的有关篇章（如《钩世》《尚博》）、虞挚的《文章流别志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萧绎《金楼子·立言》、裴子野《雕虫论》、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以及范晔、陆厥、江淹、萧纲等人的有关文论，等等。这些文学专论专著也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理原则，启发了后世的文论家们的思考，有些更成为后世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 （二）对文学的地位、本质和特点的新认识。

重视文学的地位，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陆机亦称文学能“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刘勰更把自己写作文论看成同注经一样可以立言不朽（见《文心雕龙·序志》），都反映了人们已承认文学有其与经学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和主体价值。在此基础上，文论探讨的中心亦逐渐由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与礼乐教化的关系，转移到研讨文学本身的审美本质和发展规律。首先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提出了“文”与“笔”的概念。刘勰以有无韵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显然不够准确）；萧绎则从性质和体裁上区分：“文”指文学作品，“笔”指一般应用文。他认为作为文学应该是文字“绮縠纷披”，音韵“宫征靡曼、唇吻道会”，情调“流连哀思”而使人“情灵摇荡”。其实早在他之前，曹丕就说过“诗赋欲丽”；陆机亦强调“诗缘情而

“绮靡”。这些意见，都着眼于文学的本质特点（感人），有助于文学观念的明确，但多从外部形式着眼，对形式主义泛滥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萧绎之论）。其次，在区分“文”“笔”的同时，对文学体裁的辨析（即文体论）亦十分热烈。早在曹丕即已开始这一研讨。他认为文章“本同而末异”，即一切文章都是思想意识（“本”）的表现，但体裁、形式（即“末”）却各有特点，各有不同。其后陆机、虞挚、刘勰都在这方面进行了认真研讨，对不同文学体裁作了分类辨析。萧统编选《昭明文选》，对文体的认识更为明确。他表明入选作品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所以把经、史、子、集等学术著作都排斥在外。此外沈约、萧子显等入史著中的文学传论，也有对文体的界说。又次是强调文学要表现人（作者）的个性的特点，从强调文学与政治伦理的紧密结合转变到抒发个性化情感的轨道上来。曹丕率先提出“文以气为主”，已是作家个性气质的强调；其后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对这一命题做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分别立足于审美特性，从心理学、生理学（而不再是从社会学、政治伦理学）论述了文学的特质，如艺术想象、灵感、形象、风格、技巧、声律等问题，深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人的论述。

### （三）新的文学理论、概念、原理的确立。

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 对文学创作方法的研讨。这是由对文学地位和特点重视而导致的。陆机对创作过程和创作的利弊得失作了系统探讨；沈约等人在总结前人重音韵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永明声病说；刘勰则以《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讨论了如何创建风格、继承遗产、以及声律、章句、丽辞等各方面的创作问题；钟嵘亦通过对诗人诗作的品评，强调创作的自然之美，以及风力、丹彩的结合问题；颜之推也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有益的文学见解。

2. 对作家作品艺术风格特点的评论。这个问题与文体辨析问题相联。例如曹丕、陆机都在其论文中指出：各个作家不同的气质才能，决定其擅长不同的文体，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体性》《定势》两文专论风格（分类及与才性、文体的关系等等）；又用《时序》《才略》两文按时代先后评论了历代众多诗赋作者的时代和个人风格。钟嵘《诗品》亦系统评论了历代五言诗作者，揭示了他们各自的风格特色和相互渊源承继关系。沈约、萧子显等亦在这方面有值得重视的见解。与此有关的是对文学鉴赏批评的态度、原则和方法的意见。曹丕最先指出：人才各有所偏，“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而要求作家切忌“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葛洪接受其观点，同时又受王充影响，竭力反对时人贵古贱今的风气。刘勰在《知音》中总结了前人意见，指出了鉴赏批评中的各种弊端，提出从多角度观察入手进行“知音”鉴赏的原则，对批评论的建立与发展贡献尤大。

3. 对不良文风（主要是对唯美主义）的批判。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大多形式精美而内容狭隘贫乏，雕章琢句严重。这使一部分见识较高的文论家产生不满。所以虞挚批评辞赋有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弊病；裴子野对南朝诗赋的形式主义风气批评更为激烈。刘勰一面大力反对“采滥忽真”“习华随侈”的不良文风，另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文学在艺术性追求上的成就，既推崇风骨又重视文采，还具体探讨了形式和技巧问题。钟嵘的态度与刘勰接近：他既肯定与赞美当时一些重要诗人的艺术成就，又反对过分追求声律和数典用事的时风，主张建立风力丹彩结合、“体被文质”的风格。他们两人的文学批评虽然仍有局限，但相对同时代的其他人，显得较为通达而全面，因而其论成就最高。

我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与范畴，在这一时期文论家们对创

作、鉴赏、风格和体裁的探讨中都已先后出现。过去有的如文质、文道、情志、比兴等，这时期都有了新的发展、演变与充实；新出现的如形神、风骨、言意、心物、情采、物色、滋味等，都成为后世长期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关于“神与物游”、“拟容取心”、“率志委和”、“以形写神”等等，都是我国古代诗人创作与审美的重要规律，为唐宋文学理论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四、发展时期——唐宋文论

这一历史时期中，隋代立国甚短，五代政治混乱特甚；宋时与南宋小朝廷并峙于北方的金代为异族统治，对文学不甚重视；因而这些朝代的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都少有成就。只有唐宋两代的文学理论得到大发展而引人注目。特别是两代的诗文理论发达，成为我国文论史上的黄金时期。

唐代国力强盛，文艺繁荣。唐初实行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使庶族地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并以文学为武器，结成集团，提出政见和文学见解，反对萎靡文风，兼作家文论家于一身，使理论与创作的关系更形密切。宋一代以重文轻武为国策，扩大官僚阶层，文人队伍亦随之扩大；加以印刷术发明，促进了学术流通，亦有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于是形成人民生活困苦，文人学士却生活优裕；国势弱而文学甚盛的局面。

自唐至宋，赋在传统文体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唐初近体诗的完成，在诗歌领域中开辟了新天地，使有唐一代诗作成就斐然。而一种新型的诗体——词亦从唐诗的繁荣中脱颖而出，并于宋代达到了鼎盛。骈文由于在日常应用中产生很多流弊，导致了以复古为革新的古文运动的兴起。于是文学创作便趋向于以诗文为主，